

城市外来产业工人居住隔离与社会融合问题研究* ——基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实证分析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Industrial Worker in Urban Area: A Study Based on Shijiazhuang, Hebei Province

马潇岚 殷洁

文章编号1673-8985 (2016) 02-0030-05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A

摘要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外来务工人员特别是城市郊区外来产业工人的社会融合问题已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通过对河北省石家庄市周边工业区外来产业工人的调查,发现其目前存在居住隔离现象,分析居住隔离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外来产业工人社会融合的影响,指出居住隔离是阻碍外来产业工人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原因。针对上述问题,从建立外来产业工人居住区、促进混合居住两个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particularly the integration of migrant industrial workers in suburbs has become one of the focal points of scholars'. By investigating migrant industrial workers in industrial zone of Shijiazhuang, Hebei Province, this article not only finds out the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phenomenon at present, but also analyzes the reason and the influence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What's more, this research puts forward two feasible solutions on those problems, namely, establishing migrant industrial workers' residential areas, and promoting mixed living.

关键词 外来产业工人 | 居住隔离 | 社会融合 | 新型城镇化 | 石家庄

Keywords Migrant industrial worker |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 Social integration | New-type urbanization | Shijiazhuang

作者简介

马潇岚

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硕士研究生

殷洁 (通讯作者)

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
博士,副教授

0 引言

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后,我国对于农民进城务工的限制逐步放开,“农民工”这一群体应运而生,他们持有农村户籍,但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城镇地区从事非农业劳动。按所从事的职业分类,“农民工”包括技术及非技术蓝领工作者、自雇人士、一小部分白领工作者及私营企业主。其中,在工厂、矿山、建筑、交通运输等企业从事简单技术工种,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人占据了农民工群体的绝大部分。本文将这部分“农民工”定义为“外来产业工人”^[1],他们是目前城市产业工人的主

要来源。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要求,我国下一阶段城镇化工作的重点是推进“人的城镇化”,即让那些长期在城市居住、生活的流动人口真正成为拥有城市户籍、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城市居民。外来产业工人正是推进“人的城镇化”工作的主要对象。然而,很多研究发现^[2-4],多数外来产业工人并没有永久居留城市的意愿。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城市化意愿?本文拟从居住隔离和社会融合的视角探索这一问题的原因,并提出改进建议。

1 研究理论与文献评述

1.1 居住隔离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国家级新区的空间选择、空间生产和管治研究”(No.41571157)资助。

表1 石家庄市被调查外来产业工人基本特征描述

	指标	数量	占样本比重 (%)		指标	数量	占样本比重 (%)
	性别	男	296		74.0	年龄	<18岁
	女	104	26.0	18—25岁	14		3.5
户籍情况	农村户籍	294	73.5	36—25岁	125		31.3
	城镇户籍	106	26.5	46—55岁	123	30.7	
婚姻状况	已婚	380	95.0	迁移模式	乡—城流动	294	73.5
	未婚	20	5.0		跨省流动	201	50.3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252	63.0		省内跨市流动	103	25.7
	初中	124	31.0	市内跨县流动	96	24.0	
	高中或中专	24	6.0	就业培训情况	参加过	56	14.0
	大专及以上学历	0	0.0		未曾参加	344	86.0

资料来源:调研问卷数据汇总分析。

居住隔离是指基于肤色、户籍、文化水准或财富差异等人口特征关系而相区别的人群在居住空间上彼此分开的现象^[5],不仅体现在居住面积、房屋设施、房屋拥有等问题上,还表现为居住空间的分离。该概念与“社会分异(social segregation)”密切相关,后者重点突出各阶层或各种族或各职业人群相互割裂相互排斥的现象^[6]。可以说,居住隔离是基于空间差异性的社会分异。

目前流动人口的居住隔离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乡—城流动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现象的定性阐述。王春光(2006)提出,流动人口进城初期由于语言、生活方式、经济能力、价值观念等与市民存在差异并且感受到强烈的被歧视感,普遍需要经历居住空间分化的过程,即居住隔离^[3]。二是通过调研数据总结,对居住隔离进行定性加定量研究。黄友琴等人通过对武汉市外来移民的抽样调查,定量计算其居住分异指数,得出流动人口居住隔离状况较为严重的结论^[6]。

1.2 社会融合 (social inclusion)

社会融合是个体与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相互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6]。国际上欧美等发达国家对社会融合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多种族、多民族国家的多元文化融合与冲突问题。而针对我国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社会的现象,国内关于社会融合

的相关研究也不断深入,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子分析。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经济层面的融合、社会层面的融合、心理层面的融合是3个主要的影响因子,而且这三者之间具有依次递进的关系^[7],即流动人口必须具备相对稳定的工作、相对稳定的收入以及一定的社会地位,才有可能与当地居民进行交往、参与社会生活以及融入主流社会^[8]。二是从各种角度提出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解决方案。王春光(2006)将介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生存状态定义为“半城市化”,并以此解释流动人口边缘性问题,提出了制度层面的解决方案^[3]。丁宪浩(2006)提出,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关键是制度与经济障碍,因此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措施主要是消除制度障碍、完善融入机制及文化培育^[9]。此外,也有学者从国内外住房政策研究角度切入,从提高农民工住房质量视角提出解决方案^[10]。

1.3 小结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虽然注意到流动人口存在居住隔离现象和社会融合困难,但很少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尤其是对于外来产业工人,鉴于其居住隔离问题的特殊性和庞大的群体数量,进行针对这一群体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本文将通过对河北省石家庄市周边工业区外来产业工人的实地调查,剖析其目前存在的居住隔离问题,分析居住隔离产生的原因

及其对外来产业工人社会融合的影响,并针对问题给出切合实际的改进建议。

2 数据来源和样本描述

2.1 问卷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笔者2016年1—2月在石家庄市无极县以及石家庄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内对外来产业工人进行的问卷调查,以及在市中心对市民进行的问卷调查。外来产业工人问卷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92份,有效率为98%,内容涉及外来产业工人的基本情况、工作性质、居住条件、社会参与度以及居留意愿等诸多方面。对市民的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95份,有效率为95%,内容涉及市民自身状况、对外来产业工人的看法等诸多方面。此外,笔者在调研过程中还随机抽取了一些工人和市民进行了现场访谈。

2.2 样本基本特征

表1是问卷调查中被调查外来产业工人的基本情况,尽管在某些情况上存在差异,但总体上他们都具有相似特征:农村户籍、文化程度偏低、乡—城流动、跨省流动人口居多。

3 城市外来产业工人的居住隔离现象与原因

住房质量及居住空间直接影响不同阶层的社会身份认同感及生活幸福感。据笔者调查,外来产业工人住房拥有率极低,多数住在工业园区内部,生活稳定性差,生活环境恶劣,公共设施不足,与市民存在居住隔离现象,影响其社会融合进程。因而,对外来产业工人生活状况进行总结并分析产生居住隔离现象的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3.1 城市外来产业工人的居住隔离现象

3.1.1 居住空间隔离

外来产业工人居住隔离存在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居住空间区位上。在我

国,流动人口居住方式多数为“就业型”聚居及“居住型”聚居,前者即在就业场所附近聚集的流动人口自发聚居区,后者多为公交线路较多的站点周边的棚户区、城中村以及城乡结合部的私人出租屋^[11]。与上述聚居方式不同的是,工业园区考虑到流动人口居住困难及工作便利性问题,将多数外来产业工人安排居住在工业园区内部,采用“集中式”居住方式,在规模上呈现出大型化与集中化趋势。而工业园区自身属性决定其地理位置远离城市与乡村,独立存在于城市边缘地带,空间位置上“边缘化”和“孤岛化”现象严重,因而集中居住在城市工业园区的外来产业工人既与城市居住区隔离又与乡村居民点隔离,83%的外来产业工人因其居住空间的隔离造成与城市市民接触不便,出现对城市生活心理上的疏离,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社会阶层的隔离现象。由于外来产业工人生活位置的“孤岛化”及社会关系的“边缘化”,导致其只是“生存”而非“生活”在城市。

3.1.2 居住状况差异

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经济研究司调查表明,目前农民工住房矛盾十分突出,他们居住环境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居住卫生条件差、流行疾病横行,进城农民工自发聚居地违章建筑多、公共设施不足,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阻隔了他们同城市居民之间的交流,严重影响了他们社会融合的进程^[12]。笔者调查发现,外来产业工人生活区基本生活设施不甚齐全,设施齐全的生活区仅占20%,座机电话、宽带网络、以及独立厨房甚至成为外来产业工人生活区中的“奢侈品”。

此外,由于工业园区内很少按照居住区的要求来配建生活服务设施,外来产业工人宿舍区的公共资源可达性较弱,城市绿地、城市交通、城市公共娱乐设施,基本服务设施等享有状况差。调查发现,近一半外来产业工人未能享受到城市绿地,74%的外来产业工人通常只能选择在社区便利店购物,70%的工人因园区内不配备公共健身场所而没有锻炼习惯,一半以上的外来产业工人从未享受到城市治

表2 外来产业工人进城前后收支情况对比

工作地点		<800元	800—2 000元	2 001—3 000元	3 001—4 000元	>4 000元
月收入	石家庄/%	0	26	47	18	9
	家乡/%	20	53	10	17	0
月支出	石家庄/%	0	72	17	8	3
	家乡/%	75	19	6	0	0

资料来源:调研问卷数据汇总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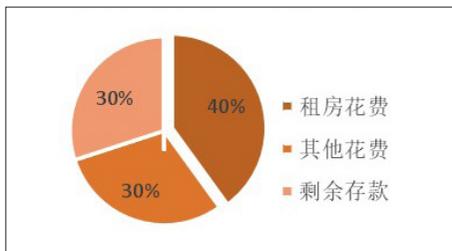


图1 租房费用占外来产业工人收入比例
资料来源:调研问卷数据汇总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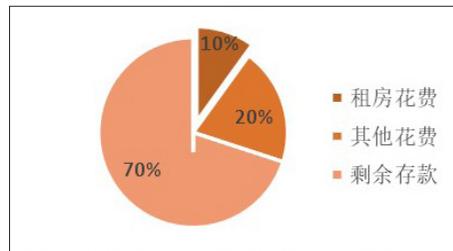


图2 外来产业工人心理预期生活费用资料
资料来源:调研问卷数据汇总分析。

安、环境卫生等各项服务,社会管理水平较低。

3.2 产生居住隔离的原因

经济因素和城市规划因素是造成外来产业工人居住隔离的两方面根本原因。第一,从经济角度看,外来产业工人经济收入不乐观,平均工资普遍较低,人均收入在2 500元/月左右,租房可支付能力较低。表2反映了外来产业工人进城前后收支情况对比。虽然进城务工收入增加,但市中心过高的租房费用决定其难以在市中心找到合适的租住房源。据调查,外来产业工人普遍反映市中心租房费用过高,超出其生活支出预算(图1,图2),而工业园区住房花费平均200元/月,外来产业工人经济竞争力不足,必然导致被困囿于低档、廉价的工业园区宿舍。

第二,从城市规划角度看,目前大中城市多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市区大力发展商业、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而将工业企业逐步迁移至城市外围。生产力重新布局客观上影响了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导致城市工业区往往远离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心。而外来产业工人宿舍多数由企业提供,企业自然将园区宿舍选择在距离工作地点较近之处,外来产业工人很难按照个人意愿选择居住地,自然就产生与城市居民居住空间分隔的状况。与城中村不同

的是,园区中居住的外来产业工人数量庞大,同质性较强,居住者成分较为单一,园区宿舍所处地理空间位置较为偏僻,与周边城镇及市中心交通不便,由此所产生的外来产业工人居住隔离现象也更为严重。

4 居住隔离对城市外来产业工人社会融合的影响

作为外来产业工人初来城市的必经过程和现象,初期的居住隔离能够帮助外来产业工人形成较为稳固的社交网络系统,在此系统中工友、同乡相互交流,使自身能较快适应城市的工作。但伴随外来产业工人在城市中生活时间的增加,居住隔离问题将带来很多负面影响,阻碍其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的进程^[13]。

4.1 居住隔离对社会融合的影响

经济融合、社会融合、文化心理融合是学界公认的社会融合的3个层面^[9]。在本案例中,外来产业工人的经济收入特征是造成他们的居住隔离的重要原因。而居住隔离进一步导致了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的融合困难。

4.1.1 社会层面的融合困难

社会层面的融合困难具体体现在与市民的互动频率上。调查发现,外来产业工人在流入地基本上不与本地市民交流,他们与其他

表3 市民能够接受外来产业工人成为其哪种社会关系(单位:%)

	同事	邻居	朋友	老板	家庭成员
是	69	45	40	5	16
否	28	50	60	93	78

资料来源:调研问卷数据汇总分析。

工友或老乡居住在一起,日常交往对象依次为:同事或亲戚占78%,雇主占52%,本地居民只占20%。这说明外来产业工人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地域和血缘关系的交流比较多,与本地居民交流较少^[12]。在被问及“您是否参加过街道或社区组织的活动”时,有38%的外来产业工人表示未参与过街道或社区组织的与市民接触的娱乐活动,35%的工人甚至从未听说过此类活动。由于生活地点的限制及个人文化属性的影响,外来产业工人很难扩大其生活社交范围,“孤岛化”的生活使其参加相关社会活动机会少,意愿也不强烈,缺少对城市文明的了解渠道,由此导致其社会交往方面融合的困难。

4.1.2 心理层面的融合困难

外来产业工人前往大城市进行劳动时,家庭背景与生活方式已经对其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若不能接受城市生活方式以及行为方式,就会感到强烈的距离感与被歧视感,进而拉大其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调查发现,在主观意识感受上,34%的外来产业工人认为市民不够友好,仅有2%的外来产业工人认为在出现困难时市民会提供帮助,高达30%的外来产业工人在与市民的交往中经常感到被歧视。另一方面,在与市民的交流中笔者发现,虽然市民不排斥与外来产业工人的接触,但是在与外来产业工人融合方面还是采取了不接纳的态度。在被问及“您能够接受外来产业工人成为您的哪种社会关系”时,市民表示他们只愿意接受工作中的正常交流,不愿意外来产业工人成为他们的邻居、老板甚至家庭成员(表3)。外来产业工人在生活中能够深刻体会到市民对他们的排斥,进而影响其身份认同及社会融合。50%的外来产业工人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仍然是农村人,6%的工人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仍很模糊,这说明外

来产业工人对自己的身份认知仍然倾向于农民。心理和文化是反映外来产业工人社会融合本质的深层次内涵^[14],外来产业工人的心理认同问题及其与本地市民融合障碍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以保障其社会融合的顺利进行。

4.2 居住隔离是阻碍外来产业工人社会融合的关键因素

已有研究认为,住房作为最重要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外来人口进入城市最重要的依赖条件,外来人口在城市的生存发展和他们的居住状况息息相关^[12]。本文的研究则发现,相较于从事白领工作的城市新移民对户籍和其他市民待遇的重视,居住隔离对外来产业工人的社会融合影响更大。根据上文的分析,居住隔离一方面影响外来产业工人与本地市民的社会交往活动,另一方面导致外来产业工人与市民的心理隔阂,而社会交往与心理认同是深度社会融合的标志。因此,居住隔离是阻碍外来产业工人社会融合最关键的因素。虽然大多数人认为社会保障不均等和户籍制度是阻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关键,但就本次调查发现,相对于居住隔离,社会保障和户籍选择对外来产业工人的社会融合影响不大。调查显示,仅有15%的外来产业工人参与了相关社会保障制度,他们更看重工作能给他们带来多少显性经济收入,而并不看重企业给他们的社保待遇。此外,关于户籍问题,外来产业工人也有多种选择,调研发现70%的外来产业工人没有把户口迁移到城市的打算,10%的外来产业工人在此方面犹豫不决,65%的外来产业工人认为户籍和其他市民待遇不是阻碍其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原因。

4.3 外来产业工人社会融合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社会融合程度直接影响外来产业工人的居留意愿,进而直接影响新型城镇化的顺利推进。朱宇等人认为,流动人口流迁模式呈现出在流入地定居、保持流动状态和向流出地回流三维分化的趋势^[4]。笔者调查发现,受目

前居住隔离问题的影响,很多外来产业工人不愿意永久居住在城市,而是选择回迁,仅有26%的工人希望在城市永久居留。在被问到“您是否愿意永久居住在石家庄”时,78%的外来产业工人表示否定。外来产业工人回迁意愿较为强烈,一是由于对故土和乡土社会的依恋,二是由于融入城市的困难性。调查数据显示,75%的外来产业工人选择回迁的原因是其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可见,促进社会融合是提高外来产业工人在流入地定居意愿,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举措。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伴随农村劳动力迁移,城市外来产业工人群体不断发展壮大。与此同时,外来产业工人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居住隔离问题,并因此阻碍其社会融合进程。本文通过对石家庄工业区外来产业工人的实证调查,分析其居住隔离状态及原因,并总结论证了其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总体而言,研究有以下结论:

第一,城市规划因素和经济因素导致了外来产业工人的居住隔离。经济因素影响外来产业工人的租房可支付能力及其生活方式,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将工业园区安排至城市外围,进而导致工业园区中生活的外来产业工人面临居住空间隔离的问题。

第二,居住隔离是阻碍外来产业工人社会融合的关键因素。居住隔离阻碍了外来产业工人与市民的社会交往,进而降低其对城市社会的心理认同感,阻碍其社会融合进程。

第三,社会融合困难将降低外来产业工人的城市居留意愿。社会融合的顺利与否决定着外来产业工人心理认同感和自我身份定位,融合困难无形中将外来产业工人边缘化和弱势化,进而降低其城市居留意愿,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顺利进行。

5.2 建议

综上所述,改善外来产业工人居住隔离

状况,提升其社会融合水平,已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工作中的重要任务。本文立足我国当前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实际情况,为改善外来产业工人居住隔离状况提出两点切实可行的建议:

第一,当前很多企业出于管理等原因,往往为流动人口提供空间小、设施简陋的集体宿舍,这样的宿舍往往靠近厂区,远离居民区,在空间区位上边缘化和孤岛化,在规模上大型化和集中化^[13]。已有研究发现,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工业园区有发展成“新城”的趋势^[15],因此建议工业园区中建立外来产业工人集中居住区,让工业园区向“新城”方向发展,同时配套相关公共服务设施,提供基本的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服务。这种集中居住区与集体宿舍的区别是,它是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居住区,具有完善的商业、教育、医疗、绿化等居住区配套设施。这是外来产业工人融入城市生活的第一步,也是现阶段最切实可行的做法。

第二,已有经验表明,混合居住是破解人群隔离、防止区隔融合、推动人群之间真正互动交融的重要途径^[13]。当前,国内各大城市已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工业园区大都远离城市中心区,而靠近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建设。《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要求优化城镇规模结构,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把加快发展中小城市作为优化城镇规模结构的主攻方向。因此,本文建议以“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为指导,引导外来产业工人积极融入工业园区周边小城镇的生活,在小城镇租房居住或置业购房,与当地居民融为一体,真正达到外来产业工人“生活”而非仅仅“生存”在城市的目,同时也为中小城市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曹荣. 改革开放下的农民工——我国产业工人主体的形成与演进[J]. 工会理论研究, 2015 (2): 14-17, 47.
CAO Rong. Rural labors in the 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formation and revolution of industrial worker in our country[J]. Labor Union Studies, 2015 (2): 14-17, 47.
- [2] 姜佳丽, 殷洁, 罗小龙. 基于特大城市外来务工人员需求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研究——基于南京市中和桥社区的调研[J]. 现代城市研究, 2015 (9): 75-80.
JIANG Jiali, YIN Jie, LUO Xiaolong. Basic public service supply based on migrant workers' demands in the megalopolis—a stud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Nanjing Zhongheqiao Community[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5 (9): 75-80.
- [3] 王春光.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6 (5): 107-123.
WANG Chunguang. A study of floating rural people's 'Semi-urbanization'[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06 (5): 107-123.
- [4] 朱宇, 林李月. 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与社会保护——从“城市融入”到“社会融入”[J]. 地理科学, 2011, 31 (3): 264-271.
ZHU Yu, LIN Liyue. Mobility pattern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social protection: moving from 'urban inclusion' to 'social inclusion'[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31 (3): 264-271.
- [5] 陈杰, 郝前进.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居住隔离——来自上海的实证研究[J]. 学术月刊, 2014, 46 (5): 17-28.
CHEN Jie, HAO Qianjin.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under 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a—evidence from Shanghai[J]. Academic Monthly, 2014, 46 (5): 17-28.
- [6] 黄友琴, 易成栋. 户口、迁移与居住分异——以武汉为力的实证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09 (6): 36-40.
HUANG Youqin, YI Chengdong. Hukou, mobility and residential segregation—a case study of Wuhan City[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09 (6): 36-40.
- [7] 朱力. 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 江海学刊, 2002 (6): 82-88.
ZHU Li. On the urban adaptability of the peasant-worker strata[J].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2002 (6): 82-88.
- [8] 田凯. 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J]. 社会科学研究, 1995 (5): 90-95.
TIAN Kai. Investigation and thinking about the city adaptation of rural labors[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995 (5): 90-95.
- [9] 丁宪浩. 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分析[J]. 财经科学, 2006 (10): 99-104.
DING Xianhao. Agricultural laborers' society melting analysis[J]. Finance & Economics, 2006 (10): 99-104.
- [10] 张国胜, 王征. 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住房政策研究——基于国别经验的比较[J]. 政策研究, 2007 (12): 39-46.
ZHANG Guosheng, WANG Zhe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rban housing policy for migrant workers: country-specific[J]. China Soft Science, 2007 (12): 39-46.
- [11] 罗仁朝, 王德. 上海流动人口聚居区类型及其特征研究[J]. 城市规划, 2009 (2): 31-37.
LUO Renchao, WANG D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 communities in Shanghai[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9 (2): 31-37.
- [12] 徐芳芳. 社会融合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状况研究——以石家庄市为例[D]. 石家庄: 河北经贸大学, 2012.
XU Fangfang. Research on the housing conditions of the new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in the respective of social integration—the case of Shijiazhuang[D]. Shijiazhuang: Hebei Jingmao University, 2012.
- [13] 杨菊华. 混合居住模式: 助推流动人口从“寄居”走向“安居”[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07-11.
YANG Juhua. Mixing living mode: helping migrant labors from 'boarding' to 'settle down'[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14-07-11.
- [14] 王桂新, 沈建法, 刘建波. 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J]. 人口与发展, 2008, 14 (1): 3-23.
WANG Guixin, SHEN Jianfa, LIU Jianbo. Citizenization of peasant migrants during urbanization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Shanghai[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8, 14 (1): 3-23.
- [15] 罗小龙, 张京祥, 殷洁. 制度创新: 苏南城镇化的“第三次突围”[J]. 城市规划, 2011, 35 (5): 51-55.
LUO Xiaolong, ZHANG Jingxiang, YIN Jie. Institution innovation: new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Jiangsu's urbanization[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1, 35 (5): 51-55.